

天朝心態中的開放觀

• 葛劍雄

如同中國傳統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樣，傳統的民族主義依然影響着現代中國。回顧以往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國人的開放觀始終是與傳統的民族主義相關聯的，今天也還擺脫不了它的影響。

傳統民族主義的基本特徵

在1899年梁啟超首次使用近代涵義的「民族」一詞之前，儘管民族主義也存在於中國，卻沒有被人們自覺地加以界定和認識，而往往與宗族、國民特別是中原王朝的國民不相區別。而從先秦直到清末，以華夏—漢族為主體的中國人用以區分民族的主要標準是文化的異同，而不是血統或種族，因此傳統的民族主義與其說是以民族利益為基礎的，還不如說是以共同的文化為界定和認同的原則的。

春秋時期，建立在同一血統的宗族基礎上的「族類」的觀念是相當強烈的。如當時流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說法（《左傳·成公四年》，公元前587年）。魯國的季文子認為「楚雖大，非吾族也」，就是根據這一原則。

但是，文化的異同已經成為「華夷之辨」的主要標準。華夏與非華夏的夷、戎、狄等族在生產和生活方式、語言、禮儀、風俗等方面的差別，自然是重要的，如《左傳·襄公十四年》（前559年）記載了戎子駒支與晉國范宣子的辯論。駒支自稱「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不過從儒家的標準出發，一個族類的行為是否符合「禮」才是分別夷夏的最根本原則。正因為如此，同樣對待「非我族類」的晉國楚國，孔子的態度就大不相同。對發生在魯宣公十二年（前597年）的晉楚邲之戰，《春秋》卻把「禮」歸之於楚而貶斥晉，因為

從先秦直到清末，以華夏—漢族為主體的中國人用以區分民族的主要標準是文化的異同，而不是血統或種族。

「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而夏人之後的杞成公，在魯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年)去世時卻被《春秋》記為「杞子卒」而貶黜為夷人，因為成公行了「夷禮」，杞人「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語言衣服有時而夷」(杜預集解)。

隨着儒家學說在中原王朝取得統治地位，這種觀念成為華夏—漢族普遍接受的民族觀，又成了歷代統治者(包括入主中原的非漢族統治者)處理民族關係的準則。任何民族，若能接受儒家教義或效忠於統治者，那就完全能與真正的漢人一樣進入最上層，以至成為中原王朝的皇帝。

如西漢的金日暉，本人是匈奴休屠王的兒子，卻當了接受漢武帝遺詔輔佐昭帝的顧命大臣，子孫累代顯貴，成為著名的士族。西晉末的匈奴首領劉曜起兵反晉時，就自稱是漢高祖劉邦之後。拓跋鮮卑成為北方的統治者後，不僅實行了徹底的漢化，改姓元氏，還編造了本族是黃帝少子昌意之後的世系(見《魏書·序紀》)。

兩千多年來，北方進入中原的匈奴、烏桓、鮮卑、羌、氏、羯、丁零、突厥、高麗、回紇(鶻)、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維吾爾、回、滿等族，和南方人數眾多、種族繁雜的夷、蠻、越、巴、夔、僚、俚等，都有大量人口融入了漢族，有的整個民族已經消失在漢族之中。這些人口大都轉化成了漢人。漢族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人口。所以，把「炎黃子孫」作為漢族或中華民族的代名詞，儘管不是歷史事實，並違背基本的民族常識，卻符合中國傳統的民族觀念，因而至今仍被濫用。

把「炎黃子孫」作為漢族或中華民族的代名詞，儘管不是歷史事實，並違背基本的民族常識，卻符合中國傳統的民族觀念，因而至今仍被濫用。

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民族觀無疑有其積極意義。由於華夏—漢族長期擁有整體上的文化優勢，所以對其他民族起着先進的導向作用，同時也給其他民族加入漢族提供了可能的機會和條件。即使其他民族不接受漢族文化，漢族和中原王朝也允許它們存在，包括允許異族人居住在自己的疆域之中。在中國歷史上雖然也發生過十六國時冉閔屠殺羯人、金後期河北漢人屠殺女真人這樣以某一異族為對象的大規模仇殺，以及各種民族間的衝突和戰爭，但卻從來沒有在漢族內部發生過清查血統一類的運動，也沒有出現過已經接受了漢文化的非漢族得不到認同或重新被清除出漢族的現象。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大多受到歧視和迫害，但來到中國的猶太人卻長期過着和平生活，並終於融合到漢人之中，這就是一個非常有力的例證。

華夏—漢族本身也是這種觀念的最大受益者。在吸收異族人口的同時，異族的文化也極大地豐富了華夏—漢文化。儘管漢族一直缺乏學習異族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自覺性，但共同的生活和生產還是使他們在實際上得益非淺。

另一方面，由於這種民族觀念是以漢族至上為基本的，它使漢族長期保持着不切實際的優越感，以至無視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存在，更不承認在總體上有向其他民族學習的必要性。二千多年來，華夏—漢族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主要還是物質方面的。

當中國的確處於世界先進地位的時候，儘管這一觀念也預伏着危害，畢竟



直到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統治者和絕大多數學者文人無不保持着高度優越感，把外國與中國的正常交往當作「朝貢」、「輸誠」或「款服」。

還影響不大。不幸的是，直到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統治者和中國的絕大多數學者文人無不保持着高度優越的自我感覺，把一切來中國的外國人視為「仰慕華風」或「歸化」，把外國與中國的正常交往當作「朝貢」、「輸誠」或「款服」。所以，當「大清國大皇帝」不得不與「英夷」簽訂屈辱的條約時，當他的臣民不得不目睹這些金髮碧眼的「夷人」在中國自由行動時，絕大多數人感到無法接受的，與其說是多少萬兩白銀或多少平方公里領土的喪失，還不如說是民族優越感所遭受的打擊。不可否認，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造成了中國人對他們的仇視與恐懼，這也是激起中國民衆反抗和暴動的主要原因。但中國傳統的民族觀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外之間的鴻溝，文化衝突有時甚至比國家利益的損害更引起人們的注意和劇烈反應。

傳統心態的開放觀

人們往往有一種說法：中國並不是一直封閉的，漢朝、唐朝都曾經是開放的，只是到了明朝以後才關上大門。所以我們有開放的傳統可以繼承，明清以

來的封閉只是一種倒退。其實這種看法是片面的，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一個國家的開放是不是就是容許外國人進來或者進口外國貨？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末中國歷史上就從來沒有封閉過，明朝不乏日本和西洋人「朝貢」的記錄，清朝宮廷中不斷增加自鳴鐘等洋貨，就連文化革命中北京的外國使館也沒有都關門，進口貨也並沒有絕迹。

我認為：即使是在古代，國家之間的開放至少應該是平等的、雙向的，無論是處理雙方的關係，還是人員往來、貨物貿易；如果進一步的話，還應該有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交流。可是在中國，直到近現代，這樣形式的開放從來沒有出現過。根本的原因不是別的，就是絕大多數中國人從來沒有具有過正確的開放觀，皇帝大臣如此，文人學者以至平民百姓也未嘗不是如此。

傳統的開放觀與傳統的民族主義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說就是傳統民族主義的產物。因為中國人既然始終認為自己居天下之中，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富裕、最發達的地方，甚至是唯一的「禮義之邦」，而對其他民族、其他國家的價值取向又是文化標準，那末當然不會產生平等的觀念。

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歷代中原王朝在處理與外國、外族的關係時，根本就不會具有現代意義的外交關係，甚至完全不承認有甚麼外交。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國的疆域本來就是無限的。至於王土之外的地方是「天子不臣」，不是不可以歸中國統治，而是沒有資格作中國的疆域。所以皇帝要開疆拓土就談不上侵略，朝廷要棄地割地也不過是賜給了夷狄，或者是因為這些地方不適合中國人居住。外國人來中國，即使是對方的國王，也只有向皇帝稱臣納貢，因為「天無二日」，所以直到1793年乾隆皇帝還儼然以接受「朝貢」「輸誠」的心態接見英國的使者。

漢唐時代是不是例外呢？顯然不是。

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聯絡月氏對付匈奴；用兵西南夷，是為了獲得境外的「奇貨」、軍事上牽制匈奴和滿足「威德遍於四海」的慾望；而發動對大宛的戰爭，除了要掠奪當地的寶馬之外，還想給寵妃李夫人的弟弟提供封侯的機會。這些行動和對匈奴戰爭的勝利，儘管在客觀上打通了中原王朝與西域及境外的聯繫，從而對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但絲毫沒有使漢武帝或漢朝人的觀念有甚麼改變，也沒有給漢朝帶來經濟上的利益。到武帝後期，國庫已經空虛，百姓流離失所，人口大幅度下降。但如此大的代價換來的是甚麼呢？見於記載的是葡萄、苜蓿、汗血馬、音樂、舞蹈、雜技，卻從未發現甚麼新的學說、思想、知識、技術，更沒有見到有漢朝派人出國學習或推銷商品的記錄。

進入唐朝的非漢族和外國人，無論在數量上還是佔總人口的比例上都是空前的，但主要卻是出於這些人的主動，也是唐朝開疆拓土的副產品。這些人中不乏商人、學者，因此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境外得到大量的傳播，陸上和海上的絲綢之路也十分興盛。儘管外來文化已經對唐代文明產生很大的影響，在某些地區甚至已使之「胡化」，但卻並沒有使唐朝人的文化優越感有過任何動搖。如果說唐太宗陶醉於「天可汗」的稱號還有實際意義，那末到了唐朝江河日下的後期，對周邊的非漢族政權早已無優勢可言了，可是唐朝人仍然把吐

人們往往有一種說法：中國並不是一直封閉的，漢朝、唐朝都曾經是開放的，只是到了明朝以後才關上大門。其實這種看法是片面的，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蕃、回鶻、南詔、契丹視為四夷，儼然以真正的主宰者自居。整個唐代出國的人數少得可憐，屬於官方派出的更是屈指可數，沒有一個是出於學習或考察的目的。

從南北朝開始，南方沿海一些港口的對外貿易已有一定的規模，唐宋以後更有較大的發展。但即使是在中國對外貿易的黃金時代，統治者也只滿足於收取商稅，卻從來沒有想到直接從事貿易會帶來的利益。他們把貿易看作對夷狄的恩賜，因而非但不鼓勵本國人參予，還實行種種限制。歷代外貿的主要受益者不是中國，而是外國商人，唐朝也不例外。

因此，儘管我們並不否認，在中國歷史上存在過比較開放的時期，但卻不能承認曾經有過比較正確的開放觀念，包括漢唐時代在內。

當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了清朝的大門以後，中國出現了通商口岸、列強的租界和勢力範圍，外國人取得了種種自由和特權。統治者雖然被迫接受了這種強制的開放，卻並未改變「華夷之辨」的觀念。儘管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逐漸為一些知識分子所接受，但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卻只能使中國人更加強了傳統的民族主義，而無法從中擺脫出來，樹立起新的世界意識和開放觀念。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應該是中國走向開放的新起點，但事實上卻推遲了30年。客觀上的確存在不少不利條件，如50年代對蘇聯的一邊倒，朝鮮戰爭，西方的封鎖，台灣問題，越南戰爭，文化革命，但傳統民族主義的消極影響依然起着作用。這使我們不能正確認識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常常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但又往往喪失了自信，陶醉於昔日的光榮，卻不能正視今天的落後；滿足於道義上的勝利，而不計較人力物力的損失；只重視文化取向（集中表現為意識形態），而不考慮國家的實際利益；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時至今日，在改革開放的十年之後，即使在文化學術界也還有這些消極影響的市場。近年來一些人對傳統文化的頂禮膜拜，已經到了以糟粕為精華、化腐朽為神奇的地步。

因此，要特別強調指出：儘管中國傳統的民族觀有其積極的一面，並且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但本質上是自我封閉的，而不是開放的。它形成和發展於中國在世界處於相對先進的時代，但在中國已經落後時卻沒有作出必要的自我調整。顯然它不可能為中國今天的開放提供經驗，更不能成為走向開放的精神力量。

近年來一些人對傳統文化的頂禮膜拜，已經到了以糟粕為精華、化腐朽為神奇的地步。因此，要特別強調指出：中國傳統的民族觀本質上是自我封閉的，而不是開放的。

葛劍雄 1945年生，浙江紹興人。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該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著有《西漢人口地理》、《億兆斯民——中國人口史再認識》、《普天之下——統一分裂與中國政治》、《中國人口發展史》、《移民與中國》等。